

自由意志的不可能实现

——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孤独意识

肖支群

(长沙学院 中文系,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 西方文学作品从古希腊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孤独意识,它与生命意识、命运意识、悲剧意识等紧密相联。孤独意识产生的主要根源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不可能实现。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孤独意识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但都与自由意志的不可能实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关键词] 孤独意识;西方文学;自由意志;异化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1-0092-06

西方文学的孤独表达方式与命运观念、生命意义、荒诞感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关于生与死的追问、拜伦的孤傲、于连的红与黑矛盾、约翰·克利斯多夫的痛苦等等,无不让人感受到西方文学深刻的孤独意识。笔者认为,孤独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自由意志的不可能实现。

一、个人意志与命运的较量——俄狄浦斯式的孤独

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主人公俄狄浦斯从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到死去,杀父娶母的命运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命运不仅让他成为弃儿、流浪者,而且让他成为社会伦理秩序的破坏者、国家灾难的制造者!他既不能得到父母的疼爱,也不能疼爱受自己命运牵累的“儿女”!他既被排除在伦理秩序之外,又被伦理秩序所束缚;他既不能置国家命运于不顾,也不能置个人生命于不顾;他既不能发泄不满或怨恨,推卸责任,也不能诉说委屈,所以,俄狄浦斯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会置身于一种绝对孤立、绝对孤独、毫无依傍、不可选择、无处逃避的处境中。

俄狄浦斯的孤独源于他的个人意志与命运力量的绝对不对等。从他得知自己的恶运开始,他就坚持不懈地独自与之斗争,想方设法地逃避命运的控制,试图弱化恶运的力量。为此,他悄悄离开科任托斯,离开皇宫,主动放弃安稳、富裕、高贵的生活,没有目的地去流浪,在异乡他国寻找自己的生存之根;在真相一步步揭开,所有人都劝说他不必再查下去

的情况下,俄狄浦斯不听他人劝阻,坚持寻找引起“瘟疫”的真凶;发现自己是真凶时,他没有犹疑、辩解、回避,而是勇敢地请求承担罪责,严厉地惩罚自己,放逐自己!这是俄狄浦斯的个人意志显现,也是古希腊人的意志体现。在俄狄浦斯刺瞎自己双眼的同时,他的个人意志就等于战胜了命运。命运虽然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并成功地将俄狄浦斯纳入它的天罗地网中,但是俄狄浦斯没有退缩,没有抱怨,没有浪费自己的生命,而是非常理性、非常坦然地经营着自己的人生!尽管命运的力量从一开始就远远超出俄狄浦斯的个人意志力量,但俄狄浦斯在这场绝对不公平、绝对不对等的“战争”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软弱、恐惧、犹疑不定、徘徊不前,他没有轻而易举地让命运的阴谋得逞,这就是人的意志!人是强大的,但也是孤独的。

关于俄狄浦斯的故事,有很多难以解答的疑问:比如俄狄浦斯的父母明知儿子会痛苦终生,为什么还要生下他?既然选择生下他,为什么又会那么残忍地抛弃他?为什么在错误无法挽回的时候他才知晓自己命运的真相?为什么他越反抗命运越是更快地陷入命运的圈套中?为什么他能猜中人面狮身妖的谜语,却不能猜中自己的人生之谜?正如让-皮埃尔·威尔南所说:“当人类企图像奥狄浦斯那样追根寻源时,他发现自己是一个谜,命途多舛,没有独占的领域,没有固定的立足点,没有确定的本质,摇摆于天神与禽兽之间。”^[1]这就是说,俄狄浦斯的

故事关乎的根本问题是人是什么的问题,他的孤独说到底就是不能确认自我、认识自我!

苏格拉底曾说:“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2]19}这似乎很好地回答了人是什么的问题。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2]8}。人对现实生存状况的理性审视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价值。应该说俄狄浦斯是极具理性品质的人,正是凭着他的理性与智慧,他打败了司芬克斯,也是理性帮他寻找到危及国家命运的真凶,更是他的理性,使他残酷地惩罚自己、认清了自己:他是忒拜城国王的儿子,是被命运诅咒的不祥之人!然而,俄狄浦斯真正认识自我了吗?他能准确地回答他是谁的问题吗?不能!这才是俄狄浦斯真正的困惑,真正的孤独之源:天地之间,他不知道他是谁!他不能确定自我!他既是忒拜城的救星同时又是其灾星,既是本土人却似乎又是陌生人,既是母亲的儿子又是母亲的丈夫!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永远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定位,这才是人最难以忍受的生存状况。他不缺乏自我意志,不缺乏理性与智慧,不缺乏高贵的出身与外表,但他缺乏解码自己人生命运的能力。这说明人的存在根本就是尴尬,甚或是痛苦灾难!

因此,“除非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指路明灯,我们就不可能对人类文化的一般特性具有真知灼见,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大堆似乎缺少一切概念的统一性的、互不相干的材料中迷失方向”^{[2]30}。正因为此,俄狄浦斯的故事成为一个哲学寓言。

二、无处安放的心灵——哈姆莱特式的孤独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的主人公哈姆莱特面对突然而至的家庭惨象,完全无计可施,深感孤独。他的孤独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家庭解体、亲情丧失。父亲死亡、母亲改嫁,幸福温馨的家一去不再;叔父谋杀父亲,亲情充满血腥。第二,爱情幻灭。哈姆莱特曾经这样向他的恋人奥菲利娅表白:“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你可以疑心太阳会转移;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话!可是我的爱永没有改变……我最爱的是你。”“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抵不过我对她的爱。”但爱情根本不可信赖,女人只是欲望的奴隶,是制造“罪人”的温床,母亲的快速改嫁和恋人奥菲莉娅对自己的试探就是例

证。第三,友情利益化。哈姆莱特曾跟军人马西勒斯、勃那多、弗朗西斯科等都以好朋友相称,与童年时的好伙伴,也是同窗好友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更是真情相待。但他们都被国王克劳迪斯收买,充当国王的耳目,处处刺探哈姆莱特的消息与动静,甚至意欲帮助国王加害于他!哈姆莱特只有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霍拉旭。但霍拉旭因为身份地位的差异,很难理解哈姆莱特内心。当哈姆莱特询问霍拉旭是否应该向一个杀父仇人报仇雪恨,是否有责任阻止“坏蛋”继续为非作恶时,霍拉旭避而言他,不予以正面支持。第四,精神上无所依傍,矛盾重重,无法确定自己的精神信仰,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支点,这是哈姆莱特孤独的最本质性根源。最困惑哈姆莱特的事,一是杀父真相,二是母亲改嫁。父亲死亡真相是父亲的鬼魂秘显的,鬼魂的话是信还是不信?是替父报仇还是置之不理?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毒箭、追求吃吃喝喝的畜生般的幸福还是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是马上杀死仇人整顿乾坤还是完全妥协过平静安宁的王子生活?这是个难题。此外,母亲改嫁的问题也让他烦恼。作为儿子,面对母亲那么快速地改嫁,他是应该谴责母亲还是应该支持母亲?支持母亲就意味着背叛死去的父亲,谴责母亲则又似乎不合时风伦理。母亲改嫁是母亲自己的意愿自己的选择,他没有权力干预或支配母亲的生活。面对这诸多难题,哈姆莱特的价值观道德观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取舍,由于找不到评判他人和事件的理论依据,找不到可以依傍的精神支撑,哈姆莱特只好以“疯狂”的姿态遮掩自己内心的孤独、痛苦和矛盾,甚至发出活着还是死去的千古感叹。

其实,哈姆莱特是因为自己无法逃避选择、无法逃避对自己的责任感而烦恼、孤独。当他从鬼魂那里得知真相时,他就已经无路可走,无法选择了,他必须替父亲复仇,甚至重整乾坤,这是他的责任、他的人生使命。由于亲情、爱情、友情甚至上帝都不可依赖,他只能依靠他自己。这就是他孤独的根本原因。“人们之所以感到孤寂,是因为他们在进行选择时不能依靠上帝或其他外在力量,而只能依靠个人自己。……个人只能信赖自己,无法信赖他人和社会。”^{[3]377}哈姆莱特的人生使命就是复仇,他别无他路,无法逃避,而且只能依靠他自己,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就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因此,可以说哈姆莱特的孤独是无处安放自己灵魂的孤独。一方面,他认定复仇是他生存的全部意义,“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喝喝,他还算是个

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放弃复仇,就如同放弃生命。另一方面,他又始终找不到复仇的现实依据和合法理由(鬼魂毕竟是虚无的),也找不到复仇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无法完成复仇使命,更无法重整乾坤,他的生存意义何在?活着找不到活着的意义,死去又不甘心,灵魂无处安放,生命的意义无法诠释,自己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这就是哈姆莱特最孤独、最难以言说的痛苦之所在。

哈姆莱特的孤独本质上依然涉及人的自我认识问题。人究竟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人的本性究竟是欲望的、恶的还是灵性的、善的?人是“毫无用处的东西”还是可以“整顿乾坤”的“巨人”?人有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活着还是死去?诸如此类的问题哈姆莱特根本无力回答,所以关于“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对他来说始终是个谜。由于无法回答人生的意义问题,无法认识自我,哈姆莱特才始终焦虑、疑惑、痛苦、忧郁。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不仅哈姆莱特无力回答,当时所有的哲学家都难以回答。或许正像卡西尔说的:“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正是矛盾。……人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奇怪混合物,他的位置是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2]16}“与其说神秘是人所不可思议的,倒不如说没有这种神秘,人就是不可思议的”^{[2]18}。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如此,以后时代的人也是如此——充满神秘,充满矛盾,充满未知的忧郁。

三、自由意志的不可能实现——拜伦式的孤独

19世纪英国诗人拜伦的生活就是一道孤独的诗。孤独是拜伦的标志。他长相英俊却天生跛足;他追求爱情却难遇真情;他结了婚却被视为疯子而离婚;他深爱英国却被认为是“瘟疫”而遭驱逐;他人格高贵却被视为流氓;他才华横溢却被认为是魔鬼,由于他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权威与专制,他和他的诗都被英国的“绅士”们斥之为可怕的祸源。他憎恶上帝:“上帝啊!我不敢想它!该诅咒的是他!创造了生命,又引它到死亡!”(《该隐》)赞美敢于向上帝挑战的撒旦:“他扑着双翼,有如雷霆万钧笼罩着覆舟累累的荒凉的海滨;眉宇间有大海的风暴浪涛翻滚;凶猛、难测的思虑把永恒的憎恨,深深地镌刻在他的不朽的面庞上,他一顾一盼,就有着幽冥弥漫苍穹。”(《审判的幻景》)他痛恨暴君,向往自由:“我宁愿永远孤独,也不愿用我自己的思想去换取国王的宝座!”(《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我不愿与兽群为伍,即使是去做他们的领袖,”(《曼弗莱德》)“假如有可能,我要教石头去反抗世上的暴君”

(《唐璜》)……从上述作品来看,拜伦的孤独不仅是因为被自己的祖国抛弃,身无归属,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无所归属。虽然他外表看上去骄傲狂妄,放荡不羁,毫不在乎,但内心却极其悲哀无助,“现在我是孑然一身,在这辽阔的海上飘零,谁也不为我叹息几声,我又何尝代别人伤心?也许我的爱犬会哀吠不止,可怜要赖他人把它喂饱,但是不消多少日子,就会把我当路人狠咬!”(《恰尔德·哈洛尔德》)

拜伦的孤独归根结底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无法实现。所谓自由意志,就是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和判断。按照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理解,自由是天赋人权。“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4]争取自由,就是争取“做自己的主人”,争取“做人的资格”。对于国家政府来说,争取自由就是争取做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争取与他人平等的权利。没有自由就没有平等,没有平等就谈不上自由。因此只有实现民主政治,摆脱奴役与枷锁,个人的自由意志才可能实现。在此意义上,“自由既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能力,如果为了取媚于一个残暴的或疯狂的主人,竟毫无保留地抛弃他所有天赋中最宝贵的天赋,竟屈从于主人的意志去犯造物主禁止我们犯的一切罪恶,这是不是使人类的天性堕落,把自己置于完全受本能支配的那些禽兽的水平上?”^[5]作为有强烈自由意志的诗人,拜伦却生活在一个仇视法国革命、维护君主政体、残酷迫害革命者、忽视人的自由意志的社会中,当然他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驱逐、被扼杀!一个渴望摆脱锁链和奴役的人是高贵的人,而一个不能实现自己意志的人,无疑是孤独的人。

其实,在西方文学史上,像拜伦这样的孤独者不在少数。于连(司汤达《红与黑》的主人公)、希斯克利夫(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主人公),还有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地下人”、“多余人”等等,他们或者追寻拿破仑,或者追求超越任何功利的自然的爱情,或者追求人类的和谐,或者追寻自我精神的充实,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有的是寻求自我认同,有的则寻求社会认同,有的寻求角色认同,还有的当然寻求文化的认同,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于连,一个生活在等级社会却不认同等级社会的生存规则,但是却又无法逃避或超越等级社会的生存规则,深为自己的平民出身或“仆人”身份而自卑的青年,因狂热崇拜拿破仑,幻想以拿破仑式的胜

利获取个人存在的价值,以拿破仑式的成功得到他人的认可与赞美。为了求证自己的存在价值,于连只能隐藏对拿破仑的热情,虚假地认同复辟时代的价值方式,积极背诵圣经,努力进修拉丁文,巧妙地应对上流社会投视过来的鄙视目光,参与各种推销自己、展示自己的社会活动,甚至有意卷入与上流社会的贵夫人发生爱情的冒险活动中。但他越想得到复辟王朝的认同,复辟王朝越是快速地将他推上断头台。他的悲剧根源在于:第一,平民身份不被认同;第二,自由思想不被认同;第三,个人才能被忽视。复辟王朝等级社会的特点就是:蔑视平民,扼杀自由,限制才能。于连恰好个人才能突出,自由思想明显,平民身份显著,是专制王朝最厌弃最害怕最需要对付的一类人,因此,一有机会就会把他们消灭。

可见,于连孤独的本质仍然是个人意志不可能实现的结果。一般而言,人不论身份立场,都有被认同的需求,只有在与他者认同的交互关系中人才确定自身。“人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他者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6]。于连在《圣爱仑岛回忆录》中看到了拿破仑,拿破仑于是成了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参照与镜像,换句话说,拿破仑满足了于连自我认同的想象:一个平民出身的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征服全世界,包括得到金钱与美女!他对自己充满信心。但是实际上他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因为他是平民,“仆人”身份是他在等级社会里存在的全部“价值”与“财富”!不论他是多么优秀的家庭教师还是多么出色的秘书,也不论他爬得多高,他的身份始终都是仆人、奴才!他越优秀,就越危险,越要被快速清除!这说明在等级社会,只要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不改变,作为平民的于连就永远无法争取到做“人”的资格,越努力做人,就越快地被毁灭。既然活着不能做人,于连于是选择以非人的方式——死亡来抗议自己被奴役的状态,争取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希斯克利夫也因为自己的“来历不明”而被排斥。他没有父母、没有家乡、没有自己的名字,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当然更没有财产。他一无所有,所以在呼啸山庄,希斯克利夫被排除在社会规则与秩序之外,理所当然的叫花子或仆人,只有被支配、被言说、干粗活的资格。但希斯克利夫没有因为自己的叫化子身份而否定自我价值,因为他的心中有爱情,爱情赋予他“人”的尊严。“一个人在他追求既定的目标,追求朝思暮想的、能够带来幸福时刻的感情共鸣的时候,会觉得生活中没有克服不了的

障碍。”^[7]所以,对希斯克利夫来说,他的身份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爱情与身份无关。可悲的是,爱情不但跟他的身份有关系,而且关系密切。因为“嫁给他,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凯瑟琳选择了背叛。失去了爱情的希斯克利夫,意识到身份的重要,他开始“努力”地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积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个人“力量”,以暴力获取地位,拼命使自己被纳入有钱有地位有身份的行列。但是他的“努力”不但没有唤回爱情,反而受到讥讽:“你多可怜啊,活着没人爱你,死了也没人哭你!”这句话如此震撼地宣判了希斯克利夫的死刑:不论他怎么努力,不论他采用什么方式,他永远不可能改变自己“陌生人”、“流浪者”、“叫花子”的身份!这个期求在爱情或在疯狂的复仇行为中确定自己存在的孤独者,最终只能以死亡的日期向世人宣告他的存在!只有坟墓,才能带给希斯克利夫纯精神的自由,及超越现实规则的纯净的幸福。

约翰·克利斯多夫也饱受平民出身之苦,面对贵族爵爷们傲慢的目光,蔑视的言语,他大声地宣称:“即使我没有你的门第,可是我和你一样高贵。唯有心才能使人高贵……所有那些自命高贵而没有高贵心灵的人,我都看做像块污泥。”为了这颗“爱真理胜过爱自己”的高贵的心,克利斯多夫孤独而倔强地与各种庸俗、虚伪、丑陋的力量斗争,虽然一次次陷入绝望,面临绝境,但他从没有退缩过放弃过。最后他功成名就,但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孩子,没有谁与他相伴终生,他的生命旅程里始终只有他一个人,孤独的一个人,为正义、为理想、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他的孤独源于他对自由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在一个没有真理、没有自由的社会里,他的抗争必然使他被排除在传统规则与秩序之外,必然受到诸多的磨难。但是他宁愿永远孤独,永远贫穷,永远“被人嘘”,也决不媚俗,决不迎合,决不屈服,“你以为我非成为一个名人不可吗?真无聊!发疯!愚蠢!……我要关起门来,只为了自己而活,为了我喜欢的人而生活。”他只尊重自己的心灵,“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真诚的人,“你们爱做什么都可以,但至少要认真!要真,哪怕艺术和艺术家因之而受到损害也没有关系!假使艺术不能与真理并存,那么就让艺术去毁灭吧!真理是生,谎言是死。”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孤独的,一个有强烈自我意志的人同样也是孤独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孤独者。一个孤独者,往往是“一个伫立在高岗上或站在世界边缘的人,他的眼前是茫茫一片未来的深渊,

头顶上是苍穹,脚下是其历史已笼罩着一层原始雾的全体人类”^[8]。

四、无处躲藏——卡夫卡式的孤独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曾经设想过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什么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9]将自己隐藏起来,越隐蔽越好,这就是卡夫卡理想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小说《地洞》里,卡夫卡却对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表示了质疑:一只小动物给自己建造了一个牢固而隐蔽的地洞,可是地洞有种种缺陷,小动物试图使地洞更完美,做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改,然而怎么修改,地洞还是不完美。它累得精疲力竭,地洞看上去还是存在大量安全隐患!这个故事极其明显地隐喻了卡夫卡内心的焦虑:世界之大,根本无处躲藏,藏在哪里都不安全,即便是最深的地窖也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焦虑不安、无处躲藏,这就是卡夫卡式的孤独,也是卡夫卡描写的20世纪西方社会的生活图景。这种图景在卡夫卡的小说中随处可见:饥饿艺术家一心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可是最终他成了人们通往兽场的障碍,人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去,就把他和腐草一起埋葬了;土地测量员K一心想走近城堡,成为城堡的合法公民,但他越努力,离城堡反而越来越远;格里高尔一心想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结果他变成了甲壳虫,这一愿望便化为泡影,他和他背上的烂苹果一起永远地腐烂掉了;约瑟夫·K无故被捕无故判刑,他一心想知道被捕的原因,一心想证明自己无罪,但结果事与愿违,他“像一条狗似的”被处死……人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状况焦虑不安,人人都在努力地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状况,但人人都以失败告终。世界如此荒诞不经,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也不受任何他人的承认和保护,人和他人、世界完全没有关联,就像阿尔比在《动物园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所有的一切都用栅栏互相隔绝。”

可以肯定地说,卡夫卡式的孤独不是个别现象,整个20世纪西方社会都患有相同的疾病,克尔凯郭尔称之为“致命的病”。在荒诞派戏剧、表现主义戏剧、存在主义戏剧与小说、黑色幽默等现代主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卡夫卡式的孤独”身影。萨特的

“他人即地狱”,斯特林堡的“不是你喝干我的血,就是我掐断你的咽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加缪的“局外人”,艾理生的“隐身人”,艾略特的“空心人”等等,无一不是对现代社会孤独形态的形象描绘。

之所以会患这种“致命的病”,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毁灭了人的一切诗意幻想,人成了永远孤独的个体,失去了现在,也失去了未来。“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情感,它们包含着各种痛苦、热情、需要、情欲、模棱两可、双关、暧昧不明、背谬、动摇。这一切只有依靠每一个人内在的主观体验才能领会到”^{[3]46},他人完全无法体会。在这种情况下,人“没有可以回归的故乡,没有可寄望的土地,不能不成为‘绝对孤独’的异乡人”^[10]。

此外,异化也是导致现代人孤独的重要缘由。所谓异化,指的是“人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自身力量及其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而是觉得自己变成了依赖自身以外力量的无能之‘物’。他把自己的生活意义投射到这个‘物’之上。”即人在自己生产的物质面前,不但“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和中枢,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他用双手造出来的机器人的奴隶。”^{[11]124-125}他生产的商品愈多,他就愈感觉自己的物的价值,他的价值取决于“他能否高价出售自己,他是否能使自己获得更多的财富,他是否是一个成功者。他的身躯、大脑和灵魂就是他的资本,他的生存任务就是把他的资本拿去投资,使它生利……显然,他的自我价值取决于他自身之外的各种因素,取决于市场变幻莫测的估价”^{[11]143-144}。一旦人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定位于“待价而沽”,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定位于事业的成功与否,那么人就成了失去自我、同自我疏离的人。他不再关心他的感情、幸福、人格尊严等,而只关心他的市场销路。他人之于我正如我之于他人一样,都只具有物的价值,人与人之间不是因为感情或思想联系在一起,而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或相互需要联系在一起。表面似乎很友好,“背后却是疏远、冷漠和许多难以察觉的不信任”^{[11]140}。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其实就是异化的突出表现,用萨特的话来描述就是,“他人即地狱”。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精神上的联系,因此,与他人、与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疏离和隔绝状态中,从而导致不可避免的孤独。

卡夫卡式的孤独其实就是现代人面对荒诞的世界,难以把握自己和他人、渴求逃避的一种内心体验。这种内心体验说到底就是对外面世界的恐惧感、不信任感,对自我存在产生的不安全感,试图以远离他人、远离世界的方式寻求内心的平衡,寻求自

以为然的踏实。这种与他人、与世界疏离的方式其实就是现代人削弱自我、轻视自我、逃避自我的方式。人作为人的独立性、主体性消失,完全成了一个与世界毫无关系、无法给自己下定义的“地下人”或“隐形人”,这既是西方现代人的悲剧,也是人类发展的悲剧。不论怎样,自我的发展与独立是人类“生活的中心 and 目标”^{[12]342},“凡是违反了肯定自我这一原则的任何理想,都被证明并不是一种理想,而只是一种病态的目标。”^{[12]346}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没有人渴望隐匿自我,只有在一个异常荒诞的社会,人们才会有如此病态的心理渴求。因此,孤独地隐匿对卡夫卡这样的作家而言,也许是能实现自我的最好方式。

[参考文献]

[1] 让-皮埃尔·威尔南.《俄狄浦斯王》谜语结构的双重含义和“逆转”模式[M]//陈洪文,水建馥.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527.
[2]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 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2.
[5]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M].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36.
[6] 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08.
[7] 瓦西列夫.情爱论[M].赵永穆,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6:165.
[8] 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黄奇铭,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294.
[9]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13.
[10] 加缪.荒谬的人·译者序言[M].张汉良,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16.
[11]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12] 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夏畅兰]

On Impossible Realization of Free Will: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in Western Literature Works

XIAO Zhiq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3,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strong sense of loneliness given out from western literature works since the ancient Greece. The consciousness of loneliness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destiny and tragedy. The origin of this consciousness lies in that the free will of an individual can never be realized. This consciousness of loneliness exhibits different conno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but all of which have an indivisible origin with impossible realization of free will.
Key words: sense of loneliness; western literature; free will; catabolizing